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独立自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

王 廷 科

四 川 大 学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独立自主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在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格局下，坚持独立自主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不能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何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革命道路必不同于西欧或俄国。可是共产国际却一直以西欧或俄国的城市中心道路来指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坚持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按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是这条独特道路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和基本经验。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方针放在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抗日时期，中共对内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外坚持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中共曾以坚定的自信心对待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革命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的事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是坚持独立自主、排除外来干涉的力量源泉。

三、建国初期照抄苏联，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但在他的晚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一度遭到扭曲。在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自力更生与国际交往的统一。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是新时期的新经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永远是我们的立足点。

独立自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邓小平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否坚持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她能否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坚持独立自主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坚持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从此，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日益密切。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一个按照高度统一和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业已成立。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①因而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便是作为“世界性政党”（世界共产党）内部的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世界革命的这一格局，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既有援助的一面，也有损害的一面，有利有弊，功过并存。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于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力量对比很不一样，因此由统一的国际领导中心发号施令，就难免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学习，相互支援，实现某种形式的国际联合。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努力，自己去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所以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这种特殊国际环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形成的这一新格局，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如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扬共产国际之所长，弃共产国际之所短，独立自主地去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可见坚持独立自主，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不能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在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下，坚持独立自主是一个必须解决而又特别困难的任务。

列宁曾经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②应当说，中国的国情比之于俄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大不相同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革命的任务不是反对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反帝反封建的落后国家。在这样的国度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显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靠共产国际的一般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是不能成功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换言之，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按中国情况办事。然而，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格局下，坚持实事求是，是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前提。如果丢掉独立自主，盲目服从远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共产国际，迷信洋教条，就势必脱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使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就必然要丢掉实事求是，在革命实践中碰壁。

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一方面，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者，打着“百分之百地忠于共产国际路线”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旗号，盲目服从共产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无独立自主，二无实事求是，使党的指导路线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绝境。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反对这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30年，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③这一重要命题。它告诉人们，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靠外国人越俎代庖，替中国人包打天下；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其认识的主体，选择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同志”自己。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演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迷信“本本”，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最早宣言。对于共产国际，他们一方面发展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面（如肯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社会内容是土地革命；革命的形势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等等）；另一方面又在斗争实践中克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方面（如打击中间势力；片面强调党和红军的工人成份；主张土地国有；以及坚持城市中心道路等等），解决了共产国际所没有解决或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立足于本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转向低潮，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必不同于西欧或俄国。可是共产国际却一直以西欧或俄国的城市中心道路来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中都是持城市中心的观点；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共产国际始终没有正确的认识。随着中国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发展，虽然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共产国际也主张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但这仅仅是为了配合夺取中心城市，“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

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④共产国际始终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⑤认为城市工人运动才是中国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依然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但实践证明，城市中心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运用，“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⑥中国革命选择什么道路，只能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批坚持武装斗争、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中国同志，并没有教条主义地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城市中心道路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敌作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早在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极其深刻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⑦这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特征和规律的高度，肯定了先农村、后城市的革命发展路线。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名的党内通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指出，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批评说：“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情认清楚。”^⑧并从中国这种特殊国情出发，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这实质上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西欧或俄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突破。事实表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确立，不是依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也不是照抄任何外国模式，而是独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结果，是中国同志独立自主地认识中国国情的结果。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⑨很显然，如果迷信共产国际，屈从于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的压力，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和独创精神，又怎么能够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呢？一句话，坚持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得以确立的基本经验。

二、坚持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中国人民。”^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是把自己的方针放在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不假外力，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空前规模的大发展，就是执行了这一方针的结果。

抗战爆发，国共重新合作。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只联合不斗争，从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⑩他认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仅是为了保存已经取得的阵地，而且是为了发展自己的阵地。他说：“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⑪在军事上又相应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里的所谓“独立自主”，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军事指挥关系上的运用，也就是在全国统一的战略意图下，保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指挥；在战略上同正面战场配合，在战役和战术上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和约束，主动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向敌后发展，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由此可见，从政治到军事，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是依附于国民党的方针。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取决于她能否坚持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也即是能否顶住来自共产国际错误意见的压力。换句话说，对内坚持独立自主是以对外坚持独立自主为条件。我们知道，由于日本侵华也孕育着对苏战争的危險，中国抗战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且也关系到苏联的安危，所以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了积极援华抗日的方针，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中国抗日战争也有消极影响，其突出表现是抗战初期中国党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出现。毛泽东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⑫王明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最“左”的方针，抗战初期又执行了共产国际最右的方针。

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上的转变，执行他们所要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缺乏信心；他认为仔细研究中国党的文件可以指出其中有使党“迷失方向的因素”。他提出应派人回去加强中共的干部队伍，“帮助中共中央”^⑬于是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王明回国后，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政治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地联合国民党、服从蒋介石，也就是片面地强调统一，忽视必要的斗争，丢掉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在军事上主张打阵地战、正规战，依靠国民党军队作战，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王明说，这是转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达斯大林的意见。王明的主张确实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要求。

我们知道，在列宁逝世后，自二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共产国际逐渐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她的基本路线是要求各国革命斗争服从于“保卫苏联”这一“最高利益”，从而导致了苏联利益与各国革命利益日益突出的矛盾。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中国抗战关系到苏联的安危，因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异常关切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但他们又不恰当地把苏联利益置于中心位置，忽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革命利益。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中国抗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拖住日本，迫使日本陷入中国长期抗战的泥潭而无力进攻苏联，因而很少考虑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1940年瓦·依·崔科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兼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斯大林向他交待赴华任务时说：“崔科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

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崔科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⑤斯大林的谈话，把苏联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至于要中国抗日，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无力领导抗战，因而只有寄希望于蒋介石，依靠国民党军队同日本打大仗，打正规战。既然要依靠蒋介石抗日，也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牺牲，放弃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服从蒋介石；唯恐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会激化国共矛盾，造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使蒋介石停止抗战。这样就会出现严重的事态，一旦日本进攻苏联，苏联就会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王明的错误主张是对中国共产党正确线路的干扰，一度造成受他影响的那些地区和部门工作的损失。

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已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是独立地制定政策，决定方针，按中国情况办事。因而能够及时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消极影响没有在更大范围和更长的时期内发生作用。由于成功地排除了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干扰，也就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扫除了障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放手发展独立自主的战后游击战争，不但有利于挫败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因而符合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而且也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才能有效地制止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活动，保持团结抗日局面的稳定，从而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才真正符合苏联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没有物质外援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不但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社会的解放准备了条件，积蓄了力量。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解放区军民渡过了1941—1942年的困难时期，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已完全达到成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自信心和自强自力精神对待共产国际的解散。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⑥。这一决定阐述了“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的真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并进而指出，自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进行了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她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这一决定科学地总结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经验，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立场和依靠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

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不断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然而苏联的存在又是对中国革命有极大意义的支援。苏联、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涉和

积极援助,两者兼而有之,同时并存。现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其政治上的成熟,极其慎重地、巧妙地处理了中国革命与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一方面尽力维护中苏两党的国际团结,避免与斯大林发生直接对抗,而且还照顾到苏联在国际上的需要,承认和赞扬苏联、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强调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抵制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涉,在抵制斯大林的错误干涉时,无论压力有多大,始终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先是顶住了斯大林“不准革命”的压力,继之又冲破了苏联领导人劝阻中国党沿长江停止进军的企图^⑩,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曾经说:“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⑪邓小平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毛主席抵制了斯大林……中国党没有听他的,结果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⑫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屈从于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压力,又怎么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呢?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信邪,不怕压,顶住了外来的错误干涉?除去毛泽东等人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坚持独立自主的雄厚物质力量。那就是说,中国的一切革命力量,包括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权,以及解放区等等,统统都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不假任何外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创建起来的,因而不受外来的控制,也不受外来的指挥。可以说,中国的事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坚持独立自主,排除外来干涉的力量源泉。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永远是我们的立足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勿庸讳言的失误。建国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⑬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针对照抄外国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反对“贾桂思想”,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⑭他曾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全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8年又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尤其可贵的是,毛泽东曾以大无畏的气概,成功地抵制了外来的干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可是随着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曾一度遭到严重的扭曲。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延伸。在“文化大革命”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被无限夸大而变形,独立自主成了夜郎自大、闭关锁国,自力更生成了盲目排外、与世隔绝,导致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停滞和科学文化上落后的严重后果。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积极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同时,也切实纠正了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歪曲,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⑮坚持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自力更生与国际交往的统一,恢复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科学面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

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复存现统一的国际组织——国际领导“中心”的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主要是围绕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正确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使之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但是走自己的道路，决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努力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大胆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利用外国的智力等等。同时又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是新时期积累的新经验。这方面的经验概括起来是：第一，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毛泽东倡导的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第二，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还包括南南合作，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等三个方面。这是政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经济关系上的表现；而经济上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又有利于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第三，决不照搬照抄西方的那一套。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东西，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更重要的是，中国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以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更不会搬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搞所谓“全盘西化”。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使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才能发展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即使发展起来，也必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重新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中国的发展选择什么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搞社会主义，但同时又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实际。换言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搞“全盘西化”；二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模式。由此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永远是我们的立足点。

总而言之，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独立自主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丰富历史经验的结晶。坚持并发展这三个基本方面，中国共产党就将无往而不胜！

当前,面对国际风云变幻,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历史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必将振奋人们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人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见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205页。
- ② 列宁《论我国革命》,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5页。
- 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4页。
-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8—1936),第94页。
-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29年10月26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8年—1936),第85页。
- ⑥ 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92页。
- ⑦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 ⑧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8页。
- ⑨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
- ⑩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9页。
- ⑪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05页。
- ⑫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11—712页。
- ⑬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 ⑭ 季米特洛夫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就中国问题的发言。
- ⑮ (苏)瓦·崔科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译本,第36页。
- ⑯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36—38页。
- ⑰ 有同志著文否认此事。也有同志著文予以反驳,指出当事人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谈及此事。
- ⑱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 ⑲ 1980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的谈话。
- ⑳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1页。
- ㉑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
- ㉒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88页。
- ㉓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1—372页。
- ㉔ 见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